



音乐博士学位论文系列

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

Series of Doctor Dissertations in Music

王福利 著

Wang Fu Li

研究

音乐学院出版社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MUSIC

音乐博士学位论文系列

SERIES OF DOCTOR DISSERTATIONS IN MUSIC

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

王福利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目 录

01	目 录
1	序 ◆ 王小盾
8	论文提要
12	英文提要
15	绪 论
19	第一章 辽金元三史及其乐志
19	第一节 辽、金史的编纂
28	第二节 辽金二史《乐志》的史料来源
30	第三节 元史的编纂
34	第四节 元史《礼乐志》的完成时间及其史料来源
39	第二章 辽金元三朝的宫廷音乐
39	第一节 三朝宫廷音乐的内容、种类及其功能

60	第二节 辽金元三朝的音乐机构
85	第三章 辽金宫廷音乐对唐、宋典章制度的继承
85	第一节 关于辽乐承唐
118	第二节 金对唐、宋礼乐制度的继承
156	第三节 辽金宫廷音乐建设发展的文化背景
180	第四章 元朝宫廷礼乐的建设过程
180	第一节 蒙古族部落时期的音乐
184	第二节 元对西夏、宋、金音乐遗存的利用
202	第三节 东平府与元立国前后的宫廷音乐建设
212	第四节 元朝立国后的礼乐建设
247	第五章 元朝宫廷音乐的文化特质
248	第一节 元朝祭祀之礼及其用乐
263	第二节 元朝朝仪的制定过程及其特点

269	第三节 元朝的朝会制度及其燕飨乐舞
287	第四节 元朝的两都巡幸制与游皇城
295	第五节 元朝的崇佛及其乐舞中的佛教内容
309	第六节 元朝宫廷乐器
327	第七节 元朝俗乐曲的继承与发展
345	结 论
349	附录一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收元达达曲名考
386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395	后 记

序

王小盾

在通常所说的“二十五史”当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一批音乐史料。这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所载的十七种乐志和八种律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故学者丘琼荪先生曾对这批资料加以整理,进行了《史记》至《魏书》等七史乐律志的校释工作;但《隋书》以后十史乐律志的整理与研究,则因工程浩大、问题复杂,而未能完成。这项任务——编纂一部完整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的任务,于是历史地落在后一代学人的身上。

学术界为什么会重视《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的编纂呢?简单地讲,是因为中国音乐史研究的需要——因为史书乐律志提供了一套反映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文本。这套文本代代联续,系统展示了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主流线索。诚如丘先生在《校释》一书的“序”中所说:“有意于了解历代音乐概况者,有志于研究我国音乐史、乐律史、乐制、乐器、乐调、民族音乐、域外音乐,乃至歌曲、舞蹈、戏剧、散乐、曲艺等等之兴亡隆替及其衍变流转情形者,请先

于历代《乐志》、《律志》中求之。本书之作，乃欲为之梯航。”就是说，这是一批内容丰富而自成系统的音乐史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考察中国传统音乐，都能从中找到基本的历史线索。对它进行校释，是建构一部完整的中国音乐史的“梯航”。丘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而近年来的学术发展，又从另一个角度把这项工作提上日程了。这就是对中国现代学科进行整体建设的角度。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一百年来的学术发展。大家知道，这是中国学科各部门实现体系化的一百年。随着现代教育的出现，包括中国音乐史在内的许多学科，相继登上了大学的讲堂。换言之，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音乐学，从它产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新学科是循着三条途径发展起来的：其一是引进新的科学方法，改造旧学科而成为新学科。例如在引入地层学、器物类型学、年代学等方法以后，旧的金石学转变成成为科学的考古学。其二是发掘新的材料，以此作为建立新学科的基础。例如在殷墟甲骨、敦煌写卷、流沙坠简、四夷碑铭、内库档案等新发现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殷商史、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学科。其三是通过学科交叉而产生新学科。例如以民族学的资料与方法研究音乐而造就民族音乐学，以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研究文学而造就文学人类学。中国音乐学的发展也经由了这些途径。一旦方法发生变化——那些对现象事物加以描述和概括的数学手段被引入音乐研究，乐学、律学和乐谱之学便从根本上获得了改观；一旦数据质量发生变化——田野资料和文物资料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中国音乐学便在“中国音乐史”之外，建立了“传统音乐研究”、“音乐考古学”等新的分支；一旦学科结构发生变化——包括历史学、文献学、科技史、语言学、社会学在内的诸种学科方法同音乐研究结合起来，中国音乐学也就成了一个成熟的学科。

尽管在目前，中国音乐学规模不算大，人数不算多，但以上情况意味着，在中国现代学科整体建设的全局之中，它是不可忽视

的组成部分。若是作一些学科比较,我们还会明白,它甚至是具有相当先进性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比较是:较之于其它历史学科,中国音乐学拥有特别悠久的历史 and 非常丰富的资料。比如,中国音乐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当中原国家把礼、乐相结合,在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仪典之时,中国的音乐理论已经开始形成强调等级之分、强调音乐沟通天人之作用的特色,产生了最初的音乐社会学和音乐美学。从此之后,伴随着礼制文献的建立,关于中国音乐的记录就是不绝于书的。历代史书为“音乐”或“礼乐”设《志》,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另一个比较是,从研究工作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音乐学拥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国史学的一些新的方法论趋向,早在中国音乐学中已经实现:一方面,中国音乐学早已注意了文献、文物、民间遗存这三部分研究资料的结合;另一方面,它一直重视对长时段现象、重复性现象进行探索。黄翔鹏先生所提出的“传统是一条河流”的理论,正是对这种研究实践的概括。这一理论还表明,在其它历史学科看来那些难以企及的理想,例如在逻辑平面上再现历史结构这一理想,在中国音乐学中却正在变成现实。

上述情况,也许不需要所有的研究者去关注。但正像在每个学科中都会产生通儒、专家两种人一样,音乐学界也必定有人懂得:新世纪的中国音乐学,承担了特别重大的责任,需要满足特别高的学术要求;工作于其中的研究者,应当有全局的关怀,以开放的姿态来建设学科。杨荫浏、黄翔鹏就是这种具有全局胸怀的人物。所以黄翔鹏曾经就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建设提出了“以资料工作为中心,开门办所”的方针,并在《对中国乐律学史学科建设问题的一个初步构想》(载《音乐学术信息》198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整理音乐古籍、汇集音乐史料的具体设想。这一举措使我们想到古代庄子的一个比喻:行百里之路,要用一宿的时间准备粮食;行千里之路,则应当“三月聚粮”。强调资料工作和

学科开放——或者具体地说，把发展音乐文献学作为资料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等音乐古籍的整理工作来建树中国音乐文献学的支撑点——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三月聚粮”。

“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与研究”这一项目，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提出来的。从1998年开始着手实施，到现在，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不断地进行了6年时间。在这6年当中，我们越来越明确地建立起了“三月聚粮”的意识，也反复遭遇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工作和丘琼荪先生《校释》一书有什么异同？这两件事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如下回答：

从文献学角度看，我们的工作 是丘氏《校释》的继续。——它的基本内容仍然是依据各种版本、各种历史文献来校勘诸史乐志，并利用全部已有成果来笺释其中的名物制度。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却是一种新的工作。其一，它在规模上改变了。它是一系列音乐文献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份，与之同时进行的有《古乐书钩沉》、《乐府诗集笺校》、《中国音乐史长编》、《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韩国汉籍中的表演艺术史料》等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有比较广阔的意义：对于中国音乐史学而言，它是一个充分的基础工作，有助于全面揭露各种历史事物的本质；对于考古学资料和民间遗存资料而言，它是具有年代学意义的工作，其成果可以作为其它资料的标准器；对于一个完整的中国音乐学学科而言，它是自成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其中必要的学科分支。其二，它在性质上也改变了。它不是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把音乐史料的整理工作和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要面向文献学的理论建设，面向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视野。现有成果表明，它将在史源学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古代乐书的聚散分合；它将从考察古代音乐资料的记录方式入手，分析音乐制度的承转通变；它将全面清理关于中国雅乐和乐律学的历史资料，重新认识作为一种文

化和文明(而不止是一种艺术)的音乐;它将把过去在平面意义上理解的“音乐”竖立起来作分层次的研究,例如区分为仪式音乐和艺术音乐来研究,区分为宫廷音乐、士大夫音乐和庶民音乐来研究,并且研究其间的关系和关联。因此,它的成果将不仅有助于指导音乐文献工作的实践,而且可以丰富已有的古典文献学理论。举一个例子:对稍纵即逝的时间艺术加以传承和记录,其传承方式、记录方式的特殊性及其文本表现,就是新的文献学将要讨论的内容。

这样一些工作,显而易见,是光荣而艰难的。作为首批进入《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工作的学人,王福利、李方元、孙晓晖、温显贵四位,因此进行了名副其实的学术攀登。现在,他们已经征服了冲顶前的另一个高地。他们在系统校勘《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所载乐志、律志的基础上,在对这些古代音乐典籍进行初步笺注的基础上,完成了《两唐书乐志研究》、《宋史乐志研究》、《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清史稿乐志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而且,经过审查,这些论文已被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纳入了出版计划。他们的成果于是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嘉惠学林了。这是一件值得祝贺、值得回味的事情。

回想起来,几位同学是按不同的方式走到一起来的。如果说李方元的方式是自觉进入一个新学科,孙晓晖的方式是逐步皈依一种新的学术风格,那么,王福利的方式便是脱胎换骨——是其中走得最艰苦的一位。他没有读过硕士,入校时,在学术经验上几乎是一张白纸。后来,他按照教学计划,进行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学术史和古典文献学等课程的学习;他接受古典目录学和校勘学训练,参加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一书的文献分类工作,以及《旧五代史乐志》2卷、《辽史乐志》1卷、《金史乐志》2卷、《元史礼乐志》5卷、《明史乐志》3卷的校勘工作;他尝试进行了三项

写作练习,一是《楚辞》与《文选》的比较研究,另外两项是同我合写的《越南所存的汉文经学古籍》、《从任半塘先生看中国戏剧研究的意义和趋向》;他还在导师指导下,通过分析资料、排列要点,提出了学位论文提纲。在学习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摆脱了惶惑和焦虑。他的经历表明,要获得一个好的学术成果,总是要作呕心沥血的付出;要获得新的视野和思维,总是要经历艰难的蜕变。正是由于这种付出、这种蜕变,王福利掌握了同资料相亲和的方法,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学术方式。

2001年11月16日,论文答辩前夕,我就王福利的学位论文提出了以下评审意见:

本文运用中国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乐律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理论和知识,以文史哲相汇通、书面资料与考古发现相参证的方法,对辽、金、元三朝宫廷音乐系统及其文化特质进行了科学论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学术贡献:

一、填补了辽、金、元三朝音乐史研究的学术空白;

二、通过对辽、金、元三史编纂过程的考察,探讨了三史乐志的史料来源;

三、通过对三朝宫廷音乐内容、种类及音乐机构建设过程的描述,揭示了三朝宫廷音乐的总体特征;

四、通过对三朝宫廷音乐建设过程及其文化背景的分析,论证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对汉族礼乐文化的继承和改变,论证了其宫廷音乐的文化特质;

五、考订出了相当数量的元代宫廷俗乐曲名,解决了元代胡乐曲名研究中的若干学术难题。

本文的总体特点是视野宏通、资料充分、结构合理,具有明确的文化史意识,是一篇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些意见意味着,王福利是在同历史资料、同客观事物相适合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个性的。由于他面对的是辽、金、元

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与文化,因此,他合理地采用了民族关系研究的思路。由于这三个政权的时间跨度很长,而辽、金、元三史的修纂时间则很短促,因此,他在研究中必然要综合各种相关学科的资料与手段,以克服史料零散的困难。由于三朝的音乐与制度各有特点,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又各有规律,因此,他抓住音乐功能和音乐文化交流这两个关键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索,在复杂的关系中建立了论述主线。总之,完成这篇论文,需要知难而进的精神和好学深思的态度。它证明学术是一项严肃的事业,证明好的学术工作不仅是对优良成果的锻造,而且是对优良人才的锻造。

任重道远,希望福利继续努力。

2004 年春节

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

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 ◆

本文以辽金元三史乐志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辽金元三朝宫廷音乐的内容及建设过程。主要研究思路是:结合10至14世纪中国南北各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背景,客观描述三朝宫廷音乐对中原王朝传统音乐的吸收与变异;在此基础上,将三朝各自宫廷音乐的种类、机构设置、乐器、乐队组成、曲调等事项同中原王朝相关事项进行比较,揭示三朝宫廷音乐独具的文化特质。全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论七部分组成,正文五章的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辽金元三史及其乐志”。考察辽金元明四朝的修史机构、修史制度及辽、金、元三史修纂过程,理清了三史乐志的史料来源:认为《辽史·乐志》的史料主要源自旧志,即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金史·乐志》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本朝实录与国史,或亦参资以当朝的《大金集礼》等,元好问、刘祁等人的著述仅于金末史料有所补益;《元史·礼乐志》完成于史书修纂首次,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及《太常集礼》为纂修时的主要依据。从而对本文研究对象的资料品质作出了评定。

第二章“辽金元三朝的宫廷音乐”，分两节。第一节，在对三朝宫廷音乐的内容、种类及其功能研究的基础上，说明了四个方面的事实：（一）辽金元三朝宫廷音乐的内容、种类、功能和中原王朝传统意义上的相关事项有显著的不同：辽朝由于实施了番汉各制的政策，宫廷音乐既番汉兼具，又各自独立。其雅乐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祀天祭祖的功能而仅用之于圣日朝贺及册仪。保留着契丹族本色的国乐既用于祭祀，又用于燕饮和宫廷营卫。与隋唐九部伎、十部伎相类，辽出现了用于燕饮的汉、女真、回鹘、敦煌、小蕃、吐浑等诸国乐。既别于雅乐，又迥别于燕乐的大乐，却是继承唐张文收燕乐四部而来的，主要用于节日、册仪等大型活动，其散乐、鼓吹乐也是既有对中原传统的吸收，又加杂有契丹族自身内容的。金有雅乐、散乐、鼓吹乐和本朝乐曲四类，其雅乐不但用于祭祀、册礼等重要仪式，也用于御楼宣赦、受外国使贺及款宴使臣，亦具有雅俗兼用的特点；散乐在吸收宋人内容的基础上又有创新；鼓吹乐杂辽、宋旧制而成；其本朝乐曲则为女真族的传统乐舞或皇帝即兴所为之新制乐舞。元主要有雅乐、燕乐和散乐三种：其雅乐源自金、宋，雅器而非雅音，在祭仪中体现出蒙古旧俗居多，雅胡之乐兼用的特点；燕乐用于朝会燕飧，亦雅俗皆备；散乐用于两都巡幸、游皇城及宴饮后的娱乐等，有来自中原的传统项目如鱼龙曼衍、飞竿、走索、踢弄等，也有变异发展的如宫中乐舞队的表演、杂剧等，更有蒙古族传统的摔跤、倒喇戏、八展舞等。应指出者，由于元廷崇佛之风甚盛，出现了十六天魔舞等新的乐舞内容。（二）各音乐种类在三朝宫廷音乐中的性质、地位亦与传统意义上的相关事项迥然不同，这是与乐种在不同朝代的各自功能紧密相关的。如辽国乐不但取代了传统的雅乐地位，且又兼有燕乐、军乐性质，而诸国乐与辽捺钵文化紧密相联，故这两种音乐在辽均高于雅乐；其大乐虽承唐张文收燕乐四部而来，但辽时已主要不是用于燕饮，而是用于大型册仪活动等，故其地位又高于燕乐。又如元

时散乐的表演不再像辽金那样用于饮宴过程,而是用于宴饮之后和游皇城、两都巡幸等大型仪式活动,史志竟略而不载,可见其虽丰富多彩,但地位并不高。(三)之所以会造成以上两种现象,关键在于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文化的接受态度、最终浸染的密切程度有很大的差异。(四)三朝散乐皆较发达,然史志或过于简略或略而不载。本文搜集考古资料、野史笔记、总集别集、方志等文献,对该部分内容作了补充和总结。第二节,通过对三朝音乐机构及其职能的描述,分别考察其对中原传统的吸收与变异,并藉以进一步阐明了三朝宫廷音乐的特征。

第三章“辽金宫廷音乐对唐、宋典章制度的继承”,分三节。第一节,通过对契丹族传统音乐的探究,对晋乐承唐及晋乐入辽传播过程的考察,论证了辽乐承唐的历史事实,透析了历史上契丹与唐帝国的民族关系,揭示出辽乐承唐更为深层的历史原因。第二节,女真族传统音乐极为匮乏,本文对其民俗、宗教等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了金在灭辽克宋时对其礼乐文物大量吸收和利用的有关记载,说明了金礼乐制度与唐、宋礼乐典制间存在的承继关系。该节的最后一部分,是对金朝出现的所谓“本朝乐曲”始末情况的阐释,论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及其在金朝宫廷音乐中的特殊地位。第三节,以契丹、女真两族与汉民族政权长期的文化交流和辽、金两朝倾向汉化的政策情况为主线,揭示了它们各自宫廷音乐建设发展的文化背景。

第四章“元朝宫廷礼乐的建设过程”,分四节。第一节,总体概括了蒙古族部落时期的音乐具有比较鲜明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特征。其礼乐文化的丰富和加强,是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以后更为广阔的文化交流背景下完成的。第二节,紧承上一节的内容,阐述了元对西夏、宋、金音乐遗存的搜集和利用情况。第三节,对东平府丰厚的礼乐积累、元初东平府礼乐中心地位的建立与巩固等历史事实进行了研讨,论述了东平府在元立国前

后的宫廷音乐建设中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第四节,通过对汉法派在世祖朝起伏状况的分析,揭示了忽必烈时期礼乐政策前扬后抑的症结所在,以及这一时期的礼乐政策导向对以后各朝的影响;描述了元中后期礼乐建设的概貌、乐人地位的卑微情况以及元廷为维持乐工队伍的稳定所推出的赈恤举措等。

第五章“元朝宫廷音乐的文化特质”,分七节。第一节,通过对元朝郊庙之礼的探讨,揭示了其祭礼中本俗之礼为多、雅俗之乐兼用的实质内涵。第二节,讨论了元朝朝仪的制定过程及其特点。第三节,考察了元朝的朝会制度及其燕飨乐舞,重在审视元朝燕乐的特殊品质。第四节,对元朝两都巡幸制和游皇城等重大宫廷活动用乐情况进行了梳理,重在展现元廷的散乐规模及其品类等。第五节,通过对元朝崇佛情况的分析,阐述了元廷乐舞中佛教内容的产生根源及其佛教乐舞内容的流变过程。第六节,对比金、宋等朝宫廷乐器,论析了元朝宫廷的雅乐器及俗乐器的继承与创新情况。第七节,主要论述了元朝宫廷俗乐曲的继承与发展概况,以有利于进一步认识该朝宫廷音乐的特质。

结论部分,立足于当时历史大背景下契丹、女真及蒙古族具体情况的不同,对他族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浸染程度上的差异,概述全文要点,总结出辽、金、元三朝宫廷音乐的总体特征。

[关键词] 乐志 史料 音乐 制度 辽 金 元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the yuezhi (樂志), which wa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hree Dynasties including the Liao, the Jin and the Yuan dynasties on music, as its object of study. Primary emphasis is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imperial court music and the build-up of music. Its major train of thought is that combining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mixture of Chinese various nationalities cultural exchange from the 10th century to the 14th century, the author objectively describes imperial court music of the three dynasties in the collection and change toward traditional music in Central Plains. On the basis of it, compared items from imperial court music with the related ones in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such as kind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usical instrument, the band, the tune and so on, the author

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 ◆